

目 录

- 汉川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县志办 (1)
- 悼张栗原先生.....董必武 (13)
- 挽张栗原先生.....董必武 (16)
- 忆死友张栗原先生.....邓初民 (16)
- 震惊省府大吏
——记汉川独立团田龙伏击战
.....二河镇志办 (19)
- 不可弃之不用重大法宝
——回忆抗日初期汉川的统一战线工作
.....董世光 (26)
- 川阳抗日游击大队成长记.....张天晖 (51)
- 威 震 武 汉
——记开辟天汉抗日根据地第一仗
.....李人林 (60)
- 竹桥之战.....谢 威 (66)
- 史沫特莱访问田二河.....董世光 (74)
- 缅怀爱国人士陈锐夫烈士.....张 斧 (78)

田二河公园落成记.....	匡子楨 (86)
一首未发表的诗.....	戴 天 (89)
我是一个秧歌队员.....	胡 沙 (92)
一身正气 一片赤诚	
——记归侨李占春先生	
.....	县志办 (97)
血吸虫病在汉川.....	县政协卫生组 (102)
汉川善书.....	县政协文化组 (110)
“马陶”的兴起与发展.....	县陶瓷厂 (112)
不平凡的农会牌.....	(115)
汉川中心县委时期汉川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示意图	
天汉地委时期汉川县、区、乡抗日民主政府示意图	
汉川政协历届会议简介.....	唐致祥 (117)

编后话

汉川首先响应武昌起义

汉川，在辛亥武昌首义打响以后，首先揭竿响应，成立了第一个军政分府。这一壮举，对保卫首义的成果，鼓舞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士气，壮大湖北地区革命声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贺觉非，在他的专著《历史的回顾》中所说的：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发动以后，“湖北所属各县首先是汉川的响应”，随后“各县义军配合当地人民纷纷起义”，革命形势呈现出一派如火如荼的兴旺景象。

志士出洋留学 追求救国真理

清代末期，由于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横干涉，使以孙中山以及广大留学生为代表的革命同志难以在国内立足；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想，难以在国内传播；由于阵阵欧风美雨卷来的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思潮的吸引，我县不少革命志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为了考察世界形势，追求革命真理，相继出国留学。

朱秀武同志在他研究辛亥革命的专题论文《湖北留学生与辛亥革命》中，记述了我县洪范出国时的情景，他写道：“汉川洪范一九〇二年底，离家出国时，条件极其艰苦，有人劝他来年再走，他回答说：‘事变日迫，吾辈求学以济时艰，须臾不可缓，欲行斯行耳’。于是携书数卷，袱被一束，孑身航海东去”。“戊戌变法”年间，在各大城市为革命而奔走的梁耀汉，

在广泛地接触中，看到国内还有不少人“暮气沉沉如处堂燕雀，不知大厦将倾”，无心奋起反抗，就决心“往海外留学，结合有志之士，作迅雷疾风之举”。遂与籍人邹动云结伴东渡，留学日本东京，从而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吴禄贞等在海外的革命同志。我县革命党人黄警亚、胡兰亭、向岩、冯亚佛等近百人，都是在当时国难深重的情况下，怀着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抱负，约担负囊，出国留学的。在国外，他们看到了三十年前没有一事不和中国一样的日本，通过维新变法，遂臻富强的情形；得到了亲聆孙中山先生教诲的机会，受到了启发和鼓舞，从而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们不畏艰险，积极利用留日条件，“观其国情，以为吾国利病之比较”，决心使中国也象日本一样，经过一番革新之后强盛起来。

与留学生一样，我县还有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怀着“痛满虏横暴，不忍使汉族河山，神圣贵胄，终古沉沦，亟思拯救”的革命激情，背井离乡，游学省垣。

积极运动军队 纷纷投笔从戎

就在他们离乡就学、渡海求知的日子里，全国各地革命党人，曾“屡次联络会党起事，都没有得到结果”。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他们认真研究事件的经过，分析失败的原因，懂得了“运动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的道理。于是，又纷纷投笔掷砚，弃文就武，回国赴省，投入了行伍酬志的生活。同时，还用“汉人多一个当兵的，满人就少一个当兵的，汉人多一人拿枪，满人就少一个人拿枪”的通俗道理，号召青年同人，使投笔从戎者络绎

不绝。如系马口的梁钟汉、田二河的向岩、虾集的祁国钧、脉旺咀（当时属沔阳县）的李诚、张卿云、莲子湖的赵士龙、县城的邹幼云等近百名汉川志士，就是本着“厕身军界，展其入穴探虎之手”投入军营的积极分子。他们为革命投身军队，熟悉军队，联络军队，掌握军队，为军队能直接参与革命和保护革命，创造了极方便的条件。

团结爱国人士 建立革命组织

一九〇四年底，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被清政府取缔，迅速建立革命党人的组织，成了革命的当务之急。当时，孙中山倡导的同盟会还处在酝酿准备阶段，梁耀汉就经常利用营管带叫其对众演讲外国革命维新故事的机会，大讲世界革命趋势、中国陆危情状，以启迪同伍，团结同人，为使清政府的反革命武装——新军，变为倾覆清廷的革命武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九〇五年初，梁耀汉与同乡黄警亚、黄金门、邹幼云一道，在黄鹤楼散财集士，宴请同学、党人七十余人，决定成立群学社，并与黄警亚共以家资为本，开办了明新公学，自己亲理校务，从国文、历史、物理、经学、哲学、算术、英文、体操、图画等各门学识上，全面地培育革命青年，使大批革命党人、爱国志士、旅省学生、行伍军人和从国外归来的同志，纷纷慕名而至。一时间，群学社、明新公学周围，聚集了革命志士数百人，使群学社发展成为唯一与日知会旗鼓相当的重要组织，也为日后汉川成功地发动起义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

在此同时，一向“对革命党人和革命事业都曾尽力维护”的汉川脉旺咀人胡兰亭，利用其在武昌外国教会中任圣公

会会长兼文华书院监学的方便，同原“科学补习所”中之汉川人邹夔斌、汤行健、李兴汉和党人刘静庵、曹亚伯等人一道，将日知会这个原属教会中的阅报室，发展改建成从事反清斗争的革命机关，使原“科学补习所”的同人得以重聚。在他的支持和协助下，日知会通过和群学社、明新公学的合并，成为了当时湖北地区最大的革命组织。曾受孙中山委派于一九〇六年五月来鄂视察党务的法人欧吉罗言及日知会时说：“日知会为当时大陆唯一的革命团体”，“国内仅日知会可为同盟会之助”。此说虽难免有不圆之弊，但当时日知会组织之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亦可从中窥见。

此外，脉旺咀党人张明阳、刘镇东、李诚、张伟及其胞弟等人在家乡组织的阳明学社；梁耀汉等人在系马口开设的阅报室；莲子湖人赵士龙在武汉组织的兰友社；以及京山党人王守愚在蚌湖设立的群治学社蚌湖革命机关等组织团体，为革命积蓄了力量，为汉川能响应武昌起义，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宣传革命纲领 统一奋斗目标

一九〇五年八月，由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她所确立的组织原则、政治目标以及明确宣言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为统一活动在国内外的一切反清组织，为各革命组织能自觉接受孙中山及同盟会的领导，树立了革命的旗帜和准则。

为了宣传这个革命纲领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梁耀汉经常召集明新公学的教员李亚东、黄金门、张庸以及优秀学生 and 汉川籍人士万鸿嗜、李端书、钟雨亭等多人，在

群学社开会，以慷慨激昂的情绪，当众演说：“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独立之人格与自主精神，若任人驱使宰割，实与禽兽无异”。强调“中国要发奋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在制定教学课程时，坚持将革命纲领溶于教学讲课之中，藉以灌输革命的思想 and 主张，启迪青年，团结同志，统一革命目标，鼓励大家以为实现革命纲领为宗旨，努力搞好组织训练，积极为革命壮大队伍。

革命党人在宣传革命纲领、统一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始终是抱定目标，从实做起的。清人石介著有《孔夫子之心肝》一书，宣传“君轻民贵，节用爱人”，在国人中已有相当影响。然而，梁耀汉却嫌其简略，他采用《孟子》精义，将该书扩充为五十条，二十四页，改名为《孔孟心肝》将其意义推广于共和政体，号召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并与黄州吴保春创立“鸠译书舍”于黄州，将《孔孟心肝》印刷万余部，散发到全省乡村和军学各界，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留学的梁耀汉，暑假回国度夏时，不顾旅途疲劳，又与同志黄寿昌、刘旻公等翻印《猛回头》、《警世钟》、《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等书，广事散发，使汉川和湖北各乡村皆有此类书籍流传，为各处同志与民众了解革命纲领，敢于讥病时弊，齐心倒清建民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好周密计划 等待时机行动

一九〇六年十月，萍、浏、醴煤矿工人起义。孙中山鉴于梁耀汉与鄂中军学各界，及帮会首领多有联系，决定派其兄梁钟汉回国请其协助。梁钟汉返国抵汉后，即召集日知会刘静庵、梁耀汉、黄警亚、季雨霖等人，于汉阳伯牙台开会，商量响应办

法。由于叛徒郭尧阶出卖，梁钟汉、刘静庵等九人被捕入狱，梁耀汉避捕逃亡，黄警亚避难他去。清廷为一网打尽，不惜重金赏格，通缉捉拿梁、黄等人，同时飭令侦探在汉川调查，派武汉缉捕队长徐升率队，会同襄河水师到系马口抄搜逼捕，弄得梁、黄两家株连受扰，邻里惊骇，梁家房舍几焚几毁，满邑人民无不寒心念苦。

暗里周旋的梁耀汉，耽心在监党人生命，力请美教会吴德施主教利用美国公使向清外交部抗议，使狱中党人得以不死。随后又与谭人凤召集长江会党，约期攻打武昌，以救同志出狱，因风声外泄，终未起事。经此几折，梁耀汉甚是忧愤，决心约同季雨霖和汉川同志周海珊、张佩绅一同赴奉天，与吴禄桢接洽方略，走项城游说袁世凯协同倒清。由于袁世凯于革命格格不入，游说终无所成。梁耀汉复潜回武汉，更名梁栋，邀约同籍任重远、谭质臣、周海珊以及季雨霖等数人，潜往四川，继续运动革命。

羁押在武昌的梁钟汉，也和监外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与同志会商议事。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的组织计划，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党人秘密商议，谋划而成的。

宣统元年（1909年）夏，梁钟汉被解回汉川监禁，他在狱中利用特殊的坐监条件和各种机会，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县中青年知其为革命党人，常至狱中接谈，梁钟汉亦借便积极宣传革命道理，赠以从海外密运来的《民报》等刊物，使青年们明确了“三民主义”之意义。同时，凡遇学生中有困难者，他皆热心解囊相助，来狱接谈的青年更加络绎不绝，每逢星期日，狱中几乎成了学生们的俱乐部。从而，梁钟汉与数以百计的青年结成了亲密的同志。这些青年，在他的影响下，逐渐成了汉川

革命运动中的中坚力量。贺觉非在《辛亥革命湖北光复情况》中写到梁钟汉在汉川被监禁时说：“梁在狱中，犹如定时炸弹，到时自必触发”。

宣统三年（1911年），即清王朝的末年，也是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后一年。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武汉起义，已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汉川起义，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年初，梁钟汉多次派岑楼等人，进一步勾通了与武汉和上海方面的联系。同年七月，有五十余名汉川党人分别参加的共进会、文学社两大革命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加快了革命的进程。是时，适逢在汉的湖北新军陆续奉命外调，客观上为武汉造成了革命的极好机会。

九月二十四日，共进会、文学社在胭脂巷十一号机关部召开联合大会，决定十月六日（中秋节）举行起义，并立即派人将起义决定，通知了在武昌的梁钟汉之妻子张荫兰及其侄子张殿臣，嘱其“赶快到襄河谋响应”。

当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正欲来汉主持起义之际，囚禁在武昌狱中的胡瑛，认为革命受挫，大为悲观，复遣岑楼送密信于上海宋教仁，力言“湖北准备还不完善，不能冒昧从事，义举须另约日期”，阻黄、宋等人来汉。沪上同志接信后，大为惊诧。梁钟汉接岑楼函告后，非常着急，认为“天下事当有激之而成，逼之而就者，不能以小挫即为悲观，革命应以不折之精神求之”。当即派人与上海方面联系，并着七弟辉汉到武昌、汉阳狱中，分别面劝胡瑛、李亚东保持镇定。

九月底，岑楼自沪返汉，将宋教仁、陈其美交给的炸药炸弹转交给张荫兰。

十月二日（农历八月十一日），张荫兰、张殿臣密运炸药炸弹到汉川，往狱中晤梁钟汉，告以武汉决定。

一直在狱中策动、组织武汉和汉川起义的梁钟汉，得知武汉起义决定后，立即着七弟辉汉分告各同志将各处保、甲、局及私人所藏之武器枪械，搜集编配，赶制炸药，备办布告、符号及十八星大旗；吩咐各同志迅速集合队伍，加紧准备，做到应时起兵发动；请业已联系成熟的城防队长余治平到狱会商接应；函告在四川同盟会任参谋长的梁耀汉：“鄂中已有准备。如果武汉起义，汉川与襄河一带，必首先响应，以为武汉犄角。”囑其在川作好响应武汉起义的准备。汉川党人和一切准备参加起义的人员，都在紧张而兴奋地忙碌着、期待着。至此，汉川响应武昌起义的准备，已经全部就绪，只待武汉打响。

十月六日（中秋节），因武昌机关破露和湖南筹备不及，武汉未能如期发动，“第一次起义计划落空”。汉川党人深知武汉首义重要，虽汉川可一触即发，但仍未冒昧先动，而是布置各部队更加从细准备，枕戈待旦。

十月九日（农历八月十八日）上午，武汉总指挥部决定当晚十二时再举。由于孙武等人在汉口政治筹备处配制炸弹时，不慎弹药爆炸，引起官方搜查革命机关和逮捕革命党人，导致起义指挥部被破坏和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惨遭杀害，使起义计划又一次落空。九日这一天，党人肖志和由省来到汉川狱中，陈述武汉种切。梁钟汉进一步吩咐各同志保持戒备，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情况。

武昌先夜起义 汉川次晚扑城

十月十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处在万分危急之际的武

昌革命党人，在失去总指挥的情况下，各标营代表主动地带领所在的新军部队，趁晚发难，占领了都督府，将十八星大旗插上了黄鹤楼。武昌起义成功了。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汉川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随即开始实施汉川起义计划。下午三时，梁辉汉、黄警亚、宋振东将部队集合在系马口，准备入夜扑城。是晚，由工人、农民、商人及军学各界所组成的千余人的起义队伍，受命起兵，直捣县城。由于计划周密，指挥有力，竟未发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全城。起义队伍会同全城绅耆周植三、晏立夫、熊荫芳、段惠六与商会会长毛玉成偕典狱官洪士纲，从狱中接出了梁钟汉。县官贺祖蔚亲自出迎，城防队长余治平也率队进入起义军行列。汉川起义成功了。欢庆胜利的群众，高擎灯笼火把，欢呼雷动，挤得满城街道，以至县衙内外水泄不通。

在一片欢呼声中，梁钟汉走上县署大堂，宣布革命纪律，声明革命是“推倒满清皇帝”，“旧有官吏”，愿走者走，愿留者留，不加杀害，士农工商，可各安其业，各群众均须维持安宁，不许坏人乘机抢劫。在场群众齐声高呼：“愿遵从指示，服从革命”。随即，对维护治安诸事，作了妥善安排。为了巩固系马口起义军营盘，梁钟汉与同志率队星夜奔赴系马口，部署军机，并由黄警亚、梁辉汉高举十八星国旗，组织起义军举行宣誓仪式。式毕，众人精神抖擞，纷纷剪去发辫，以表示与封建制度诀别和反抗满清统治的决心。事后，梁钟汉、黄警亚、宋振东、童文轩、黄金门、张殿臣等披星戴月，复返县城，连夜邀请城内士绅，在县高等小学堂举行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汉川革命军政分府”。公推梁钟汉为总司令，黄警亚任参谋长，黄干臣为参谋主任，李圣言为秘书长，谭质臣为军

需主任，梁远达为稽查主任，张殿臣为副官长。任命：参谋梁辉汉、张荫兰、陈君谦；秘书邹幼云、周耀村、陈少武；执法胡宗尧；军需袁筱三、梁诗经；稽查梁远德、梁诗智、梁诗慧、梁诗敏。对旧城防队和巡防队进行了改编。官兵无不表示：“愿听命驱遣，努力为军政分府服务”。为保证军政分府及起义军的粮秣供给，随即组成了以毛玉成、邹幼云、周华堂为主要成员的调查公物保管处，组织捐输，筹集粮饷，全县富户商民，皆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精神，纷纷自动捐粮献款。局势既定，政府已立，梁钟汉一面率同各职迅速展开工作，一面着专人往武昌报告情形。

武昌军政府深察汉川为武汉藩篱，宜革命党忠实同志镇摄。当得知汉川军政分府建立以后，即由战时总司令黄兴正式委任梁钟汉为革命军政府汉川分政府总司令和襄河游击总司令；令梁等率汉川义军，扼守襄河各要隘。军务部长蒋翎武批准发给汉川义军快枪五百支，子弹二十万发。统编汉口军政府武装为第一支队司令部，汉川为第二支队司令部。派武昌起义中的有功人员汉川籍人张卿云、京山籍人王守愚奔赴汉川，分别担任副司令和参谋长，并派有随行李端书等近八十人，来到汉川，协助整编队伍。将汉川起义民兵编成五个营，委黄警亚、金淑芳、张子英、胡宗城、梅占春五人分任营管带。汉川军政分府在此编制之外，复设一独立营、三个支队、一补充队、一敢死队。委陈占胜为独立营管带，专门训练一营新兵，作骨干之用；委张殿臣、杜厚斋、梁达五分别为一、二、三支队队长；余文甫为补充队队长；张荫兰为炸弹敢死队队长。当时，汉川起义军声势浩大，使敌人闻风丧胆。

军民积极参战 保卫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的胜利，立即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恐慌，急忙调动段祺瑞、冯国璋，率领大军，顺京广线迅速南下，直通武汉，企图以先取汉口为桥头堡，进而拿下武昌，一举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武昌军在汉口与清军浴血奋战，终因敌我众寡悬殊使汉口失陷。

当时，能否守住武昌，取决于汉阳的得失，而能否守住汉阳，则又取决于汉川的存亡。

汉川地处武汉西缘，当汉水下游之要，形锁汉阳之阴，北连孝感，径通新沟，直逼京广铁路；南据系马口而望蔡甸，紧护汉阳之背，实为汉阳的三面门户。南下清军的策略正是先取汉川。他们表面上集兵汉口，佯攻龟山、南岸咀等处，暗地里遣兵经孝感、应城间道，将主要兵力调往新沟、蔡甸一带，直压汉川。同时派遣巡防营统领刘韞玉带队沿襄河水陆而下，欲纠合汉口清军，进逼武昌。

汉川军政分府明察此情，深知形势险恶，责任重大，立即指挥部队于仙女山、四汉河筑炮台；与江苏援鄂第一师师长黎天才部，汇成两万余人的大军，驰骋江汉，东抵孝感，布防新沟，直控京汉铁路，使段祺瑞、冯国璋的部队停留于孝感、应城一线“不敢越雷池一步”。并根据敌我态势，审时度势，派兵沔阳，与京山义军刘英部，协同包围抄袭刘韞玉水、陆部队于仙桃、岳口一带。由于事先运动，敌军中已有同志策应，再经我军投以炸弹，猛烈冲击，敌军纷纷缴枪投降。二、三日内，刘韞玉五营之众，即告瓦解。我军获得炮船三十四艘，枪弹无数。进而进兵天门，进取钟祥、潜江、监利等县，有

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清军，使汉阳义军得以从容布防，保卫了武昌起义的成果。

县志办公室 高鹏 整理

学习张栗原先生爱国图强精神

努力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编者按：著名爱国图强教授张栗原（又名朗轩）先生，系汉川县南河区人。早年从事国民革命活动，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兼省教育厅中学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积极帮助我党疏散、掩护干部，主动解囊资助许多革命同志。曾受命赴日本考察教育。生前写过不少专著。

张栗原先生对于新文化的开创，对于旧教育的改革，对于国民革命都作过积极的贡献。他既是一位爱国图强的著名学者，又是我们党的忠诚朋友。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病故。为缅怀张栗原先生，学习他爱国图强的献身精神，特将董老《悼张栗原先生》及其挽词和邓初民《悼死友张栗原先生》等珍文，奉献给读者。

悼张栗原先生

董必武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定于十一月三十日为故教授张栗原先生开追悼会，这距张先生逝世的时候已一百一十日了。在重庆住着许多敬仰先生的人，从报上看到先生归道山的凶耗，莫不震悼。也曾有人想在这里举行一幕追悼的仪式，终以敌机肆虐，朋友流散下乡，大家不容易晤面，没有实现。文理学院所

举行的追悼会，也许有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即令知道了，也不能躬亲致奠，这总是我们大家所公认的一桩恨事吧！

我认识张先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那时我同几位朋友在武昌创办一所私立中学名武汉中学校，校中教职员差不多纯粹是尽义务的。这些教职员大多数是张先生的同学，如倪季舟、陈潭秋、钱亦石、李莲舫诸先生，都是在武汉中学很出力的职员和教员。张先生那时在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任级主任，我经过陈、钱诸先生得以认识他。他底和慈的容颜，诚恳的态度，谨饬而恳切周详的言论，给人以历久不渝的印象。

武汉中学开始招生，允许学生以白话文应考，教国文课自然是着重在白话文，那时教部章程不准男女同校，武汉中学招收了几名女生与男生同班授课，在现在看起来也许不成什么问题（实际上还是问题呢！）可是在二十余年前，不能不说那是一种大胆的改革。这些改革张先生是支持的。为着鼓吹教育上的改革，陈、钱诸先生在武昌出版了一个刊物，名《新教育》，张先生和我在那刊物上写过文章，我们都是新教育社的社员。张先生深研教育原理，又办理小学多年，学识经验都很丰富。他的文章在《新教育》上很受欢迎。这一刊物因外界压力，出了几期就夭折了！张先生也实际卷入革命斗争中，而成为国民革命的一位英勇战士，一位前进的国民党党员。

张先生加入国民革命运动以后，我们在武汉的革命工作，获得一个很方便的支点，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这因为附小主持人是张先生的同学，而他的学问人品及多年教育工作的成绩，使他在附小教职员中学生中有极高的权威，我们就在张先生掩护下活动。记得在一个暑假中，我们在高师附小开过几天三十余人的会议。也办过短

期训练班，高师附小主持人因张先生的缘故，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国民革命运动在湖北比较开展，得这样的一个掩护支点的力量，实在不小。

大革命时张先生为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兼省政府教育厅科长，那时的省教育厅长为李汉俊先生，李厅长对湖北教育的整顿和改革，多得先生的赞助。环境变化，民国十六年，先生奉湖北省政府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因而流寓东京。先生在高师研究教育与生物，留东京后，更肆力于新兴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诸科均卓然有所成就，这从邓初民先生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

我识得张先生很久，可是在武昌教书的时候，并没有闲工夫彼此往来谈天，见面在会议时最多。先生到日本后，住东京乡下，我于民国十七年夏天同亦石到东京，先生特从乡下赶来，握手道故，同逛铺店，并到小馆子吃中餐，盘桓数小时，分手后我同亦石西行，先生则仍滞留在江户的附近乡村。

民国二十一年季夏我经上海往赣南时，先生已返沪，又约我过其寓所并留餐。款款深情，一如曩昔。谁知道这一次的晤面，竟是最后一次呢！

先生是一位醉心研究学术不求闲适，韬幅无华的学者。用新科学方法研究教育的，据我所知尚只有先生和钱亦石。亦石已于民国二十七年谢世，今先生又亡，可说是学术以致革命力量之一大损失。我和先生有九年未见面，未通讯，遽闻噩耗，缅怀旧友不禁悲从中来，我虽然悲感，我并不失望，先生在湖北学生以千数，后来在暨南、广大及文理学院等大学施教，沾润先生教泽的，也有成千累万的人，先生运用新科学方法研究学问，开辟门径，则继先生志事的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光辉的